



# 大写的历史

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黄朴民 著



当历史变成了文学，  
真相敷衍为杜撰，感性取代了理性，  
我们需要怎样的视角阅读历史？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黄朴民 著

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 大写的历史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 黄朴民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339-4445-2

I. ①大… II. ①黄… III. ①中国历史—历史事件 IV. ①K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8973 号

责任编辑 徐 莺 朱 敏

特约编辑 李 焯

封面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版式设计 吕翡翠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责任印制 朱毅平

## 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黄朴民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181 千字

印张 15.5

插页 2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445-2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序

历史事件是历史的主体，这一点，当是殆无疑义的。如果抽掉了历史进程中那些重大事件，那么，整部历史真的会是“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了”！以秦汉历史为例，我们无法设想，如果去掉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楚汉相争、汉武帝反击匈奴、盐铁会议、王莽改制、光武中兴、白虎观大会、党锢之祸、黄巾暴动等事件，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秦汉历史，还能留下多少具体的印象，那些古今之慨又当从何而发？

正因为历史事件是历史嬗递的最显著呈示方式，那么，显而易见，对历史事件的回顾、解读、总结，理所当然也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考察其背景、揭示其原因、观察其萌芽、梳理其过程、释读其高潮、了解其余波、总结其影响、分析其意义乃是众多历史工作者呕心沥血且又乐此不疲的使命。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所在，也是历史学充满诱惑、使人难以拒绝的价值所在。

然而，历史事件的解读与总结，实在是非常困难的。这中间固然有受史料不完整、记载多矛盾的客观条件限制的因素，即所谓“文献不足征”的局限，但是，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主体基于自己的阅历、史识、立场、好恶、爱憎，而对客观的历史事件投射主观上的倾向性认知导致的偏差。俗云“有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

姆莱特”。孟子亦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可见，研究者对历史事件的解读、认知与总结，往往带有其强烈的主观色彩，搜集史料、选择史料、凝聚观点、形成判断，通常都掺杂着个人的倾向性，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难以避免地做出选择性的遗忘或选择性的强调。

尤其让后人困惑的是，即使是那些原始史料，其历史的真实性也往往是可以存疑的——这些史料的记录者、提供者，在当时同样也受其主观认知的判断与驱使，从而在记叙历史事件本身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淡化、消解、抹煞某些要素，而强化、渲染、夸大另一些要素。如此，就使得后世的研究者所接受的历史信息，本身就是不全面、不系统、不客观、不准确的，要在这样残缺的信息基础之上，对历史事件进行公允的解读，那的确是一种大为不易的挑战，其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勉为其难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是历史事件研究中的局限与困境。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利与弊的统一体，利中有弊，弊中有利，历史事件解读与认知上缺乏纯客观性的困难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它拥有了更宽阔更充裕的解读与总结的空间，给后人提供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认知契机。对同样一个历史事件，人们的理解，可以大相径庭；人们的看法，可以仁智互见；人们的分析，可以众说纷纭，从而造就一番新义迭出、异彩纷呈的生动局面。多样性、复杂性、综合性本来就是历史学研究的显著特征，而历史研究者的主观色彩，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激发了历史研究的活力，也增添了历史研究的魅力。即给现代受众接受和认知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历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创造了更多的机遇。历史学研究自身，也在这种普遍关注和参与之中，被注入强大的活力，体现出存在的价值，得以生

生不息，永葆青春。毕竟片面的深刻，远远胜于全面的平庸；大众的兴趣，保证了历史学研究的热度。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也热衷于对历史事件做富有个性化的解读与认知，并将所见集腋成裘，聚沙为塔，于是，便有了这本小书。虽然固知学殖浅薄，而读史的识见，更属平庸，但是，敝帚自珍，“愚者千虑”，或许不无一得，所以，还是不昧谫陋，将它呈示于读者诸君面前，抛砖引玉，以匡不逮。幸赖有识之士、大方之家，惠以教我，是所期冀。

是为序。

黄朴民

2015年1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 目录

### 涂脂抹粉后的历史

- 真相难觅  
——“赵氏孤儿”背后的历史重构 | 003
- 孔门造圣运动 | 015
- 汉武帝“建元改制”的政治风波 | 020
- 汉代“独尊儒术”表象的背后 | 031
- 汉代“表章六经”的政治文化学意义 | 035
- 歧路彷徨：“党锢之祸”与汉末儒林群生相 | 047

### 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交锋

- 国策与国运  
——析汉武帝身后的政治走向 | 059
- 当虚幻的理想撞上坚硬的现实  
——王莽改制的悲剧 | 071

079 | 《隆中对》的怪圈

084 | 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

095 | 政治博弈：魏孝文帝迁都

101 | 千古楷模：贞观之治

108 | 从“陈桥驿兵变”到“杯酒释兵权”的演进  
——赵匡胤的胆略与权谋

### 为人臣的智慧

131 | 未央宫的奇冤

138 | 功高震主，祸患将至  
——君逼将反的故事

146 | 君子斗不过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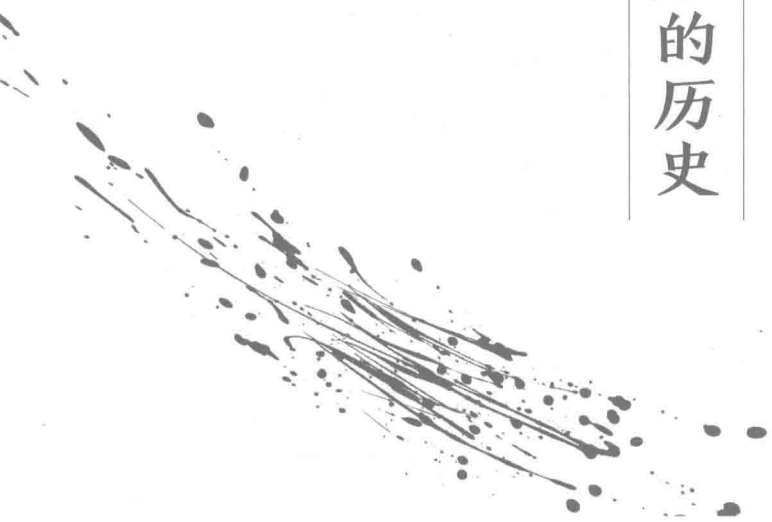
### 逐鹿中原，争霸天下

153 | 晋楚争霸战争的来龙去脉



战略均势与弭兵大会	161
从争霸到兼并 ——晋阳之战的标志性意义	169
中国古代王朝崛起战争中的战略指导 ——以秦汉时期为中心	174
晋景公与齐晋鞏之战	191
柏举之战 ——争霸战争重心的南移	200
<b>兵者,诡道也</b>	
兵无常势 ——韩信“背水阵”揭秘	209
“五兵之中,唯火最烈” ——火攻与赤壁之战	221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萨尔浒之战	228
先秦野战歼灭战的典范 ——长平之战	235

涂脂抹粉后的历史





## 真相难觅

——“赵氏孤儿”背后的历史重构

历史上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是历史重构战胜历史真实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简直就是真实历史遭到蓄意歪曲与重新建构之后所形成的一个神话。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而以此为题材的戏曲、文学作品的渲染，更使得它不胫而走，风靡天下。这个故事甚至还进入过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视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印证。近年还被拍成电影，让普通民众穿越历史，梦回春秋，重温了一段本来颇为陌生的晋国历史。总而言之，“赵氏孤儿”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的书斋，更是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领域。

“赵氏孤儿”的故事内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描述的：春秋时期晋国武将屠岸贾仅因与忠臣赵盾不和，且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之故，竟设计杀灭赵盾家族三百人，仅剩遗孤赵武被程婴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换日”之计，以牺牲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为代价，成功地保住了赵氏的最后血脉。二十年后，程婴告诉了孤儿赵武这一切，赵武终于痛报

前仇。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为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这是历史戏剧和民间传说中的“赵氏孤儿”，但它可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有史实为依据的，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称的《史记》。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国赵氏家族于晋景公三年（前597）惨遭灭族之祸，史称“下宫之难”。赵氏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复兴了赵氏的基业。

《赵世家》的具体记载是这样的：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他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所弑一案，并有意借题发挥以诛灭赵氏。韩厥劝说赵朔赶快逃走，但赵朔没有答应。在屠岸贾的蛊惑煽动下，诸将进攻赵氏于下宫，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将赵氏灭族。

赵朔的妻子（史称赵庄姬）是晋景公的姐姐，当时已怀有身孕，变乱中，她仓皇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友人程婴说：“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答：“赵庄姬有遗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不久，赵庄姬生下一男。屠岸贾知道后，便带人到宫中寻找，但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屠岸贾不会甘心，必定会再来查找，该怎么办？”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还是你做难事，而由我来做容易的，让我先行一步吧。”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藏到山中。程婴偷偷找到诸将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

告诉他孩子的藏身之处。”诸将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攻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不能随赵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啊！”于是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天啊！赵氏孤儿何罪？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诸将不应，于是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程婴从此背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遭谴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赴死。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知道。”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筋骨来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曰：“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于是拔剑自刎而亡。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其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说，读来令人血脉偾张、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时期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旁人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中有关“赵氏孤儿”的

记载就大相径庭，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标榜。

《史记·晋世家》是这样记载“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赵庄姬与赵婴有奸情，事情败露后，赵婴被赵同、赵括兄弟驱逐出晋国，并客死在齐国。赵庄姬因此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进谗言加以诬陷，说“赵同、赵括将要作乱”。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

变乱发生的当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并无遭追杀的威胁。不久，韩厥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的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须存在并出现了；三是关于“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的记载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相一致。也就是说，是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赵旃则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

《史记·晋世家》中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是有所本本的，这个“本”，就是它更早的出处，即先秦原始史籍《左

传》与《国语》。换言之，《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历史学最忌讳“孤证”，《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逻辑与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是孤证，难以赢得天下之众的高度信任，因为其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重构的重重迷雾之中。

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述相对平直，却同样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

《左传》等史籍记述“下宫之难”的基调，是展示一次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大宗之间以及各大强卿豪门之间互相倾轧的冲突，斗争的各方，都不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动机，而仅仅是为了排斥对手、消灭异己，攫取更大的权力。这看起来貌似公正，实则不然。但细加体味，我们可以发现，这段历史的叙述者，还是多少流露出其好恶爱憎的倾向性态度的。

叙述者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赵氏这一方的，对赵同等人遭遇灭门之祸抱有深切的同情与怜悯之心：晋景公轻易相信赵庄姬的诬告之辞，这难道不是昏庸糊涂？将曾对晋国发展有大贡献的赵氏置于死地，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刻薄寡恩？让与赵氏有隙的栾氏、郤氏做伪证，给赵氏落实“莫须有”的罪名，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蛇蝎歹毒？所以，叙述者虽然表面上是从权力之争的角度叙述这个历史事件，但实际上，处处蕴涵着自己的思想立场、价值取向，巧妙地为赵氏鸣冤叫屈，不露声色地对晋公室加以贬损抨击。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的真实原因只能是从维护胜利者的立场出发，有意识地对历史加以选择性的重新建构。

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记叙“下宫之难”的史籍中，《左



传》是始作记述者，换言之，它是《国语》《史记·晋世家》叙事上的母本。所以，“下宫之难”事件的历史重构之发生，穷本溯源，就必须从《左传》说起。

据学者研究的结果，《左传》一书在记叙春秋诸国历史中，以载录晋国的史事最为翔实。那么我们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测，晋国的国史，是《左传》史料的主要来源。现在的问题是，构成《左传》的晋国史料文献是否足够可靠，是否属于不带任何倾向性的客观历史。

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以界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和考察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为基本前提。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崔述与杨伯峻的观点较为合理，值得参考。崔述《洙泗考信余录》称言：“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这里，崔述给《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上距定、哀未远。”

今人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进一步加以考证，得出结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前386）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如果崔、杨等人的考据结论可信，那么，《左传》的成书时间是在“三家分晋”之后数十年，当时晋国已不复存在，它已作为一个曾有的符号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左传》对晋国历史的描述，具有很显然的追叙性质，而追叙则意味着历史的重新建构有了运作的空间，意味着写史者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可以作有选择性的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那么其追述春